第 52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6
2015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5

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经济学的视角

林 毅 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一、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处于世界顶峰①。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到了 19 世纪中叶后变成为一个贫穷落后,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②。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在探讨救国救民,让中华民族重新富强之道,发生于 100 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此为宗旨。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 50、60 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推动了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以图强。甲午战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推动戊戌变法,试图像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那样实行君主立宪的体制来救亡。孙中山、黄兴等则发起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 2000 年帝制,在公元 1911 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革命虽然成功,在 1915 年新文化运动之际,诚如梁启超所言:"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反,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③陈旭麓指出:"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④

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梁启超一样,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仅在于物质和制度上,还在于学术、道德、思想层面上,并且东西方的文化是不可调和的。陈独秀直言:"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⑤胡适则指明:"我们必须承认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资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学人家。"⑥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全盘西化",用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反对迷信,用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用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这种主张影响深远,20 世纪 80 年代中,一部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作者把中国的文明称为黄色文明,把西方的文明称为蓝色文明。他们认为黄色文明是内向的、保守的,蓝色文明是外向的、开放的、积极的,中国要现

本文发表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百年——回顾与展望"高层论坛。

① 历史学家 Cipolla(1980)研究公元 1000 到 1700 年欧洲社会的结论是:和中国相比,当时西方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则是一个富有的、发达的工业经济。

② 根据 Maddison(2006)的研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 1820 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 33%,到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前 2 年的 1913 年时只剩 9%,到 1950 年时进一步下滑为 4.6%。

③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8 页。

④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5 页。

⑤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1 号。

⑥ 胡适:《胡适文选》,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年版,第 3 页。

代化必须从黄色文明变成西方的蓝色文明①。“必须死心塌地去学人家”也可说是我国学术界这一百年来不少学者的基本信条。②

从实践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这100年,中国显然并未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样进行全盘西化。以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现状为标准来衡量,我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仍然有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这些差距从西方现有的理论来看是由于我国的体制机制问题所致③,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未阻碍中国的进步,尤其是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1979到2014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总量增长了28.3倍。按市场汇率计算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④

1979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仅182美元,低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达到760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期间6.8亿人摆脱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为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⑤ 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贫穷落后国家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Lin,2011a)。按照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规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之时,中国有可能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下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届党代会选出的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时,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之时我国学界有必要以这100年的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来反思新文化运动当时的认识和倡导的观点,并对民族的复兴提出新的看法和主张。

二、经济基础是文化先进或落后的标准⑦

新文化运动之意是要改造我国传统、落后的文化以追赶西方先进文化。然则,何谓文化?根据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

① 这种看法和Weber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如出一辙。Weber(1958)在其名著《基督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得益于基督新教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天主教的精神束缚后取得的成就。

② 例如,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后发优势或是后发劣势的争论中,杨小凯主张:“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天则双周》181讲,2001年12月1日(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181.htm)。

③ 例如,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产生了租金和寻租行为,导致了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恶化。国有产权的安排导致不平等竞争,效率低下。

④ 蔡昉、李周和我在1994所著《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曾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则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当时少有人相信,前一预测已经在2014年提前一年实现,后一预测已成为国际上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共识。参阅Subramanian(2011),World Bank(2011).

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联合国开发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为主要职责,但是到2000年时,如果不计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脱贫的人口,世界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

⑥ 其他两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为韩国和我国台湾。

⑦ 本节取自作者发表于2009年5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6卷第3期上的“经济增长和中国文化复兴”。

的总和。除了强调可代代相传之外,此定义跟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统一整体之内涵基本一致。不同的学者因分析的方便,对文化的内涵会有不同的划分,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倾向于使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①: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② 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形态是游猎,生产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共有、共享。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伦理、价值和组织方式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可以储存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单个家庭为克服各种风险透过血缘的纽带来解决生存保障的问题。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 年鸦片战争时,从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西方则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和基督教的“博爱”(Fraternity),都有“爱人”之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也难分高下③。其实,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 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固然也表现在

---

①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文化三因子,见费孝通译的《文化论》中的介绍。

② 用文化的三个层次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运动演变的脉络最为清楚,开始时中国的忧国之士只看到器物不如人,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掀起了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败后才认识到制度亦不如人,而触发了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创建共和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列强的加紧侵略,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五四运动(Lin,2011a)。

③ Fraternity 指的是基督徒之间的兄弟之爱,译成博爱并不准确。

于组织层次的不同,根本则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①。当弱势文化遭遇强势文化时,弱势文化如何追赶强势文化？中外学界和政界精英分子的认识和努力会从直观的器物层次的追赶逐步向上提升。

三、尚无以“西天取经”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认为发达国家所以那么先进、发展中国家那么落后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样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做好学生”,学会这些道理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推行,就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以我的专业领域发展经济学为例,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应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开始独立自主追求现代化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新的子学科。从二次大战到现在,70 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追求现代化的成果如何？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表明,在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 1950 年到 2008 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后,继续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国台湾。中国大陆这部分,有望在 2020 年前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从 1950 年到 2008 年,只有 13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 13 个中有 8 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 8 个,另外 5 个是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②。其他 18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经过 70 年的努力,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水平。③

发展经济学开始形成时的主流思想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倡导者就像洋务运动的先驱,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发达国家先进的产业和技术,导致劳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率先发展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的先进产业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先进产业。

这个理论因果逻辑很清晰,很有说服力。二次大战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政策,基本都按照这个理论来制定,推行的结果则是在开始几年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后,经济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战以后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从传统、小规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才逐步升级到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这种发展战略从结构主义来看是错误的,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为新自由主义所取代。当时的倡导者和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的推动者一样,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发展绩效差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有

---

①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别其实也在于经济基础。现在各个文化体都担心美国文化的侵略,但是在一百年前,美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一百年间,美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和政治社会组织没有变化,为什么从文化沙漠变成强势文化,无非是经济基础提高,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政治经济组织形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羡慕、模仿的对象。

② Pierre-Richard Agenor and Otaviano Canuto,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210, 2012.

③ 值得反思的是,东亚这些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经济水平(器物层次)上赶上发达国家,制度层次也随着经济基础的提升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是,并没有完全照搬欧美的共和宪政,更重要的是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原有的核心伦理、价值。一个文化只要核心价值继续保存就不消亡,并且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提升、繁荣而昌盛。见林毅夫“经济增长和中国文化复兴”一文中的论述。

太多扭曲干预,这些干预扭曲不仅造成资源错误配置,而且会创造由行政干预扭曲所形成的租金,导致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的恶化。这个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的解释逻辑也很清晰,道理也很有说服力。

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制定,主张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次性的取消掉,以让市场发挥作用①。但是 20 多年过去了,发现推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普遍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平均经济增长率比 60 年代、70 年代结构主义时期低,发生危机的频率则更高。有些经济学家把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 20 年。② 中国、越南以及 1970 年初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等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当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则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的转型。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表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绩效比较好,赶上或大量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经济体,他们政策在推行的时候,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所倡导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死心塌地去学人家”的主张在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发展上显然不成立。

四、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理论自主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发展和转型的国家没有成功的例子,而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的发展和转型政策在推行时,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和真实世界的相似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逻辑来看是严谨自洽的,但是,按照理论制定政策推行的结果会事与愿违,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有一个亲身体验。1987 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工作,1988 年我国出现第一次 18% 的高通货膨胀。从西方学过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看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一定会主张提高利率来治理,认为提高利率后资金的价格提高,投资需求会减少,提高利率会鼓励储蓄,消费需求也会减少,通货膨胀就会降下来。但是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利率,而是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结果是通货膨胀治理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半拉子工程。这种治理方式从主流理论来看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推行的是错误的政策,中国政府就是不理性的,可是,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怎么能够从 1979 年到 1987 年维持年均 9.9% 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样的选择一定有道理。

中国有一大批资本很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关系到城市里 50% 甚至更高比例的劳动者的就业和国防安全,如果提高利率,资金成本增加就会亏损,政府不给补贴就会倒闭,影响到就业和国防安全,不敢也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所以提高利率以后,在当时财政收入紧张的情况下,就要以增发货币的方式给亏损的企业补贴,货币增发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只能直接以行政手段把那些跟社会稳定、国防安全无关的项目砍掉。西方的主流理

① 经济学界经常谈到的一个笑话是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会有六种不同答案,谁都不能说服谁。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在主流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见 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 - 253.

②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 - 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 - 157.

③ Lin, Justin Yifu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论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政府补贴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以,这个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不过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它是有效的。

西方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所遇到的困境,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条件的差异之外,还在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也随着西方国家自身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在变化。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为例,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在 1936 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才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但是在凯恩斯之前并不是没有宏观经济理论,当时的新古典理论认为经济下滑的时候,投资需求减少,利率就会下降,就会鼓励投资。利率下降也会减少储蓄,鼓励消费。投资和消费增加,经济就会平衡,所以不需要政府的作用,市场会自动调节。但是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导致 30% 多的失业和大量的过剩产能,利率即使降到零,没有好的投资机会,企业家也不会投资,就业不能增加,经济将长期萧条,必须由政府以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去创造投资和消费需求,经济才能恢复均衡。凯恩斯主义提出后曾经盛行一段时间,60、70 年代出现了滞胀,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只是提高了通货膨胀率,并未导致就业增加,经济增长加快。原因是到了 60 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基本恢复平衡,不是原来的失衡状况。于是在 80 年代出现了回归到新古典理论的"理性预期"学派,反对政府使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假定经济中各种调整不需交易费用,并且瞬间完成,现实则非如此,于是就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两者均认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干预长期来说无效,短期则有作用。这些理论提出来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 20 年左右经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起伏,被称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非常成熟,根据这些理论形成的政策可以使经济不再大的波动。没想到 2008 年出现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最近国际货币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欧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退休前发表了一个反思,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测 2008 年危机的来临,而且在解决当前的危机也无能为力,例如,2010 年时发达国家在 2009 年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开始出现了复苏,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来看是很正确的,但是推行的结果却是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二次探底。他现在反思,当利率接近 0 的时候,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使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需求也不会增加,于是总需求下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在这些经验事实面前,过去经济学家绝对反对用增发货币支持政府的赤字财政的政策,现在则很多经济学家支持。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也是随着发达国家的条件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应用发达国家理论来制定政策,到底依据那个理论?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运用都必须要有和理论相适应的条件才能有效,条件变了理论也必须随之而变,更说明发展中国家若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时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在于很容易变成一位批判家。西方主流的理论都是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其假设前提的,而且,经常还是以在发达国家也尚未能完全能够达到的理想条件为前提。和发达国家对比,一个发展中国家除了经济基础的差异外,也必然有体制的落后性和过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看,这些体制的落后和扭曲都有成本,因此,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主流理论作为前提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理想的前提条件。以此来批判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似乎逻辑很清晰,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是问题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经常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

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追赶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努力需要有理论的指导。100 年前新文化运动开展时,西方国家的发展一日千

里,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全盘否定的心态,主张“死心塌地去学人家”,其忧国忧民之心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值得敬佩。但是,100 年来 20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经验和制度来推动现代化的诸多努力,除了西欧周边几个同一文化体系、本来差距就不大的欧洲国家以及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外,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小龙。这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在追赶发达国家的时期,推行的主要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也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伦理。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努力上,认识应该有所提升。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中,闭关锁国不行,承认差距,虚心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明白学习什么。

作为经济学家,最近我倡导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政策,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得出《国富论》中那些政策的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表明的方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宣扬的政策是亚当·斯密研究他所观察到的那个时代国家财富创造背后的原因,据此,提出一套逻辑解释和政策建议。但是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如果条件不变,理论确实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但是条件是在变的,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大师大都是遵循亚当·斯密的这个方法去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现象,认识这些现象性质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提出因果逻辑的解释而创建其理论的。①

理论的适用性既然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否和真实世界的条件一致,自然现象的发生不会因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有不同的条件,因此,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是,经济社会现象则不同,社会科学的理论若要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就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去了解存在于我国的各种现象的性质和原因是什么,自己提出理论来解释。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帮助国人了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是什么,以形成社会共识,齐心协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理论是一套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到 2020 年时我国可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只要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到建国 100 年,我国肯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我国经济现象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现在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影响也会越来越大,21 世纪有可能迎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世界级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象所提出的理论解释,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发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所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选方案,跟其他发展中家国家、转型中的国家更接近,总结于我国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会更有借鉴价值。世界上 85% 人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和我国一样都有实现自己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和追求,来自于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还有可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不仅是物质的丰富,而且还将是思想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在世界的引领。

五、结语

新文化运动的先贤在 100 年前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在国家衰弱、民族沉沦、

① 亚当·斯密在1776 年出版《国富论》时观察到的是 18 世纪中叶之前,国际贸易带来西方国家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财富增加的贡献,所以在《国富论》中他强调贸易、市场和分工。当时,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亚当·斯密并没有注意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经济发展、国民财富增加的贡献。后者是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才总结出来。

生灵涂炭之际,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号召全盘西化以救国救民。100 年后我们迎来了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作为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以更为冷静平和客观的心态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过去这 100 年来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 30 多年的实践一再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制度此路不通。同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了解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根据自己的条件提出理论,与时俱进,动员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那么中华民族必能不断克服困难前进,在保留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提升经济基础,推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完善,成为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之一。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很有可能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如果这个预期可以实现,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个拥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的国家。

参 考 文 献:

[1] Cipolla C. M., 1980.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 – 1700,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2]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Lin, Justin Yifu.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1. No. 2.

[5] Lin, Justin Yifu, 2011a.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Lin, Justin Yifu, 2011b.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Vol. 4, No. 1 (Feb. 2011), pp. 1 – 14.

[7] Lin, Justin Yifu,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dea,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9] Subramanian, Arvid. 2011.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1] World Bank, 2011. *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2] 费孝通等译, 1946.《文化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3] 冯友兰,2000.《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4]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英文版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6.

[15] 林毅夫,2007."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第 44 卷第 4 期。

[16] 韦伯,马克斯, 1997.《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李　铄)